四平日报 SIPING RIBAO
2022年10月21日 星期五
编辑|赵艳红 魏静 校对|赵健杰

四平第一家制药厂的几度变迁

侯景宝

1993年11月，四平市把两家企业同时划归中化集团，一家是四平联合化工厂，另一家就是“四平市制药厂”。

1958年，因四平市没有药厂，在时任市卫生科科长的提议下，由四平市医药公司、药材公司、四平市医药分站三家投资6万元，抽出18名职工，于当年7月1日在原物资回收公司地址（现四平市铁东区新光路12号）建立了四平市中西制药厂，生产丸制中药，隶属于市人民公社文教部领导。1960年，四平市中西制药厂更名为：四平市制药厂，工厂下设2个股，2个生产车间，隶属于四平市重工业局领导。1962年，工厂下设5个股，2个车间，隶属于四平市轻工业局领导。1962年，市制药厂与市油脂化工厂、市油酒厂组成联合企业公司。1969年，工厂成立革命委员会，厂行政机构由股改为组，下设政工组、生产组。1972年，四平市制药厂隶属关系发生变化，改由四平市第一轻工业局领导。1981年，工厂行政机构由组改为科，设有行政科、组宣科、生产科、财务科、供销科、质检科、设备科、综合车间、冲剂车间、蜜丸车间、前处理车间，隶属关系改由四平市化工局领导。1985年，工厂隶属关系由化工局领导改为四平市医药管理局领导。1989年3月，召开首届股东代表大会，工厂改制为股份制。

1993年11月8号，四平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签署协议，四平市制药厂划归中化集团，更名为“中化四平制药厂”。1997年，脱离中化集团，回归地方政府管理。1998年5月18日，四平市人民政府与海岸实业集团公司签署协议，海岸实业集团公司整体购并四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。更名为“海岸集团四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”。2001年7月13日，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四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破产。2002年12月25日，吉林省一正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整体购买四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。更名为“四平一正药业有限公司”。2003年4月23日，更名为吉林一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。经过20年的发展，如今的吉林一正药业集团已经发展成为集中药材种植、科技研发、生产经营、医疗服务、健康酒业、旅游观光为一体，拥有三大生产基地，六家全资子公司，员工3500余人，生产能力达20亿元的大型现代化民营企业集团。

首任梨树县委书记沈亚钢

单志

1961年3月，沈亚钢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。1961年末，马庚任东北局经济委员会轻纺局副局长。沈亚钢和马庚都是高薪阶层，但他们的生活十分简朴，每天的吃穿用都非常节省。家里除了几张木床、几个书架外，几乎没有其他摆设。他们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，从来不给孩子零花钱，更不准孩子买零食吃。他们为了工作，晚上很晚回家，但早晨却起得很早，领着孩子在沈阳北陵跑步锻炼，培养他们的意志和耐力。虽然家里有保姆，可他们让孩子自己洗背心、短裤、袜子。从小养成勤劳、刻苦的好习惯。大儿子沈志明任辽宁纺织工业非织技术开发中心情报中心主任。二儿子沈立明，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，成为中美合资辽宁国际自动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女儿沈阿梅，在沈阳丝绸总厂实验室工作，子女们至今保持着父母的勤奋简朴作风。

沈亚钢于1966年12月12日去世，1978年其骨灰安葬仪式在沈阳举行。沈亚钢是行政八级，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。

（完）

清末梨树城的文泉胜迹

魏晓光 鲍姝燃

清光绪四年(1878年)春天，奉化（今梨树）县开始组建，同时也设立了学校。第二年，知县钱开震与训导赵万泰组织人力修建学校殿宇，在学宫前挖掘泮池时，出现了双泉涌出的绝妙现象。

泮池又称泮宫、泮水，它是古代学校前方半月形的水池，也是官府办学的标志。古代“诸侯不得观四方，故缺东以南，半天子之学，故曰泮宫。”在泮池上或两侧一般建有桥，称为泮桥。科举考试时，学生过桥去拜孔子，称为“入泮”。

据《奉化县志》卷之二地理（上）胜迹篇记载：“文泉，在学宫。初凿泮池，忽双泉涌出，左右各一，奇绝。”另在《奉化县志》卷之十二艺文（上）中收录了奉化县训导赵万泰所作的“泮水文泉记”、武林钱宗昌所作的“泮池文泉记”、夫子陈文焯所作的“泮宫文泉记”，都对双泉这一奇异现象进行了描述。

百年前的梨树城位于边塞，属于蒙古的腹地。建县时居民多为流民，混杂而居，没有礼仪教化。境内十分偏僻荒凉，缺少山水景观。然而，建学宫院落门前出现的双泉（文泉），可称得上是胜迹奇景。

光绪五年(1879年)，创建奉化县学宫。最初选择的地基本来在地局的南侧，由于一些纠葛而搁置，于是改建在了向西延伸的高岗之地。孔庙大成殿及其大成殿东西两侧厢房相继告成后，商议在大成门外修建泮池和泮桥。施工掘开地面才数尺深，忽然像鸟的翅膀一样在桥东西两侧有两股泉水涌出，在场的人们欢呼腾跃，连连称奇。人们都认为此泉涌出，是吉祥之征兆。

虽然涌泉是吉兆，但是它一直这样涓涓涌出，积水越来越深，泮桥的基础就难以在这里建立，影响施工，于是主持工程建设的人员决定将这两股泉水先暂时填上了，等到泮池、桥座都修建好之后，再进行开启。没想到，第二年泮池、桥座建好后，想把泉眼打开时，泉眼竟然已经干涸了。人们推测，只有等到学署人才辈出时，泉水才会再次涌出。为了以示纪念，于是人们在原来泉眼的地方用砖砌成了井壁，以此来标记胜迹，并寄予厚望。

三年后，陈文焯夫子来到这里做客，为奇异双泉取名“文泉”。并用诗句歌颂文泉：“于皇文治兮，天子之光。光被四表兮。远讫遐荒。巍峨美富兮，数仞宫墙。人杰地灵兮，地脉动而泉涌双。泮宫成而颂声作兮，继思乐于鲁邦。翳人文其日盛兮，将流泽之孔长”。诗词的大意是：国家重视文化教育，连偏远的奉化县都建起了文庙和学署，相信这里将来一定会书声朗朗，人才辈出，畅通的文脉就像此地涌出的泉水一样源远流长。

童年的悠车

朱乃波

悠车，又称摇车或悠车子，是满族人发明的一种简便传统的育儿工具，是婴幼儿成长的摇篮。那时满族的先民过着渔猎生活，需要妇女和男人一起骑马打猎，婴幼儿放在家里很不安全，于是他们就用树条编成摇篮，拴上绳子，吊在大树的树杈上，随风轻轻晃动，这样小宝宝既安全又舒服。后来进入了耕种时代，有了固定的居所，人们就把悠车挂在房梁或棚杆上，悠孩子很方便。这就是东北流传甚广的三大怪“养活孩子吊起来的”由来。

古时的悠车是用树条编成或用桦树皮制作，两头是半圆形，状似小船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制作工艺的提高，悠车改用椴木或柳木的薄板制作，趁湿把两块板弯成U字形，用皮条缝连对接缝，使其成为长椭圆形。长约一米，宽60厘米，高30米厘米左右，两端略微上翘，再钉上底板和横梁。悠车两侧各镶嵌两个铜环，外面刷上红色的油漆，并绘上花、鸟、龙、凤等图案，有的还写上福寿等吉祥的题字，非常美观。也期盼着孩子健康成长，长大成龙成凤。

使用悠车时，用两根粗麻绳兜住底部，穿过两侧铜环，每侧绳子的上端挂上一个铁挂钩，居室的两柁之间安放一根横木，叫搪椽，把铁钩挂在搪椽的绳套上，把婴幼儿放在悠车里，轻轻推动，像秋千一样荡起来，小孩儿就安然入睡了。天冷时，悠车里放上鸭毛或鹅毛口袋，上面再铺盖被褥，防寒保暖。天热时可以铺上谷草口袋，散热去火。

悠车靠惯性前后晃动，孩子躺在里面，就像在妈妈的臂弯里摇晃，容易入睡。天热时悠车悠动起来，会带来徐徐的凉风，还可以防止蚊虫叮咬，孩子睡觉会感到很舒服。不用抱着，母亲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做一些家务。

悠车是哄孩子的工具，是孩子成长的摇篮，也是母亲的好帮手。我家姐弟五个，大姐出生后，姥姥给送来了一个悠车，我们姐弟几个，婴幼儿时都曾在它的怀抱里成长，我和姐妹们对悠车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

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一个炎热夏季的晚上，母亲把妹妹放在了悠车里，轻轻地推动着悠车，悠车的绳索摩擦着搪椽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，母亲站在悠车旁，轻轻地推动悠车，嘴里轻声哼唱着：“月儿明，风儿静，悠车轻摆动，娘的宝宝，闭上眼睛，睡在了梦中……”伴随着母亲委婉动听的歌谣，妹妹一会儿就酣然入睡了，母亲坐在悠车旁，一边纳着鞋底，一边不时地推着悠车。这个温馨而亲切的场面，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
我大姐12岁那年，妹妹才两岁，母亲要上街里去买东西，把妹妹哄睡放在悠车里，让姐姐照顾着妹妹。母亲走后，大姐站在地上，二姐站在炕上，两人就来回推着悠车，你推一下，我推一下，悠车越悠越高，速度也越来越快，两人高兴地哈哈大笑。后来悠累了，速度慢了下来，姐俩又将悠车往一个方向推着转圈，悠车上面的四股麻绳像麻花一样拧起来，然后俩人同时撒手，悠车就像陀螺一样，快速地旋转，悠车还在左右摆动，大姐在地下猛地把悠车往前一推，悠车一下就立起来，妹妹就从悠车里摔到了炕上，哇哇大哭起来。姐姐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急忙抱起了妹妹，还好，没摔坏。不一会儿母亲回来了，了解了情况，姐俩挨了一顿骂。

母亲做家务时，我也曾推着悠车哄妹妹入睡。悠车上的绳子上挂着大红花，还有一个葫芦。妹妹醒了也不哭，睁着明亮的大眼睛，望着葫芦，伸着小手，笑着咿咿呀呀，说些谁也不懂的话 。

童年的悠车摇来了燕子衔泥，摇来了花开花落，荡来了枫叶嫣红，荡来了雪柳晶莹，一个又一个孩子在悠车里长大，走进了沧桑岁月。

悠车像一艘小船，承载着童年的天真与欢笑，承载着家庭的温馨与欢乐，也承载着母爱与亲情！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美好的回忆！

第二编
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
（1931年9月—1945年8月）

党史

1941年6月的一天，蒸汽车间日本工头中野吩咐中国工人刘积德与另3名工人更换气缸盖上的管子。他们4人分两组轮换作业，当何玉林和另一名工人在等候换班时，被来查岗的中野发现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怒气冲冲地用铁棍子朝何玉林打去，何玉林顿时头上鲜血直流，疼得他昏了过去。等何玉林苏醒过来后，愤怒的蒸汽工人决定帮助何玉林教训中野。狡猾的中野得知后，暗中向何玉林许愿，但事后却不付诸行动。何玉林又要到宪兵队告状，中野无奈只好给了何玉林60元钱。

在沦陷时期的苦难岁月里，四平人民反抗日伪统治的斗争从未停止过，各阶层的民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，如发生在梨树县的民众反日斗争，就充分证明中国人决不甘当亡国奴的决心和勇气。

1936年前后的几年间，梨树县孤家子镇老公林子农民张贵，在当地群众的有力支持和联合署名保护下，多次进行反捐抗税斗争。他对为日本卖命的伪官吏、伪警察恨之入骨，面对狐假虎威、仗势欺人的汉奸走狗，敢斥敢骂，多次挥拳痛打，以暴抗暴，大快人心。

1943年冬天，几个体检合格准备入伍的“国兵”，在街里见一名警察将一个卖菜老农踢倒在地，将菜筐踢进水沟。几个青年义愤填膺，上前和警察讲理。但伪警察蛮不讲理，双方打了起来。几个青年追至一家饭馆门口，又有几个警察上来帮凶。恰好正有几个“国兵”在饭店吃饭，见此情景，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，于是他们在饭馆找到木棒、铁锹，冲出来将几个警察打得头破血流，大盖帽子满街乱滚,围观众人拍掌称快。

1944年，日本人在榆树台假以招工名义，骗走王振生等30余个农民，带到农安强迫干苦力。王振生等发现被骗后，同大家商议，决定以有病为名拒不出工。汉奸工头找来两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，端着刺刀，强迫他们出工。王振生等无处讲理，气愤难平，挥起铁锹砍倒日本兵和汉奸工头，大家乘机逃离虎口。

同年11月，县内有360余名劳工，被集中起来送往哈拉巴山。途中，负责押送的日本兵对中国劳工非打即骂，肆意欺辱。如此非人待遇，激起劳工们强烈愤懑。一天夜里,按照商定好的计划，大家突然奋起反抗，用大镐和铁锹当武器，与手持枪械、刺刀的日本兵发生激烈格斗。除20余名体弱病残者未能脱身外，其余劳工都趁天黑在混乱中逃走。

（三）杨氏三雄战日寇

杨海、杨江、杨河三兄弟都是大土山站的铁路工人。九一八事变后，每当他们看到铁路上不断运输日军军火物资，用来攻打中国人时，就怒火填膺。他们三兄弟暗中组织了20余名铁路员工，活跃在大土山、卧虎屯、骆驼岭、玻璃山一带的铁路运输线上，只要日军的军车在此通过，他们就采取行动。1933年秋的一天，他们听说日军的军火要从大土山铁路线通过，三兄弟带领20几名员工连夜拆掉几十块连接铁轨的鱼尾板，使列车通过时脱轨。还有一次，满载物资和军火的日军列车在郑家屯到太平川这条铁路线上通过，三兄弟带领20几人，乘夜间火车停车之机，卸下一段铁轨，使列车颠覆。

当日军得知是杨氏三兄弟带头干的，就到处搜捕他们。但三兄弟平时深受群众敬佩，都热心帮助他们。一个名叫沈勋章的工头，唯恐三兄弟遭遇不测，就偷偷地把三人藏到自己亲戚家。日寇闻讯后立即到沈家搜查，在搜查时，日本人木夏的狗乱吃沈家的东西，被一个员工看见打伤，日本人借机抄了沈家，并打伤了人。工人们见事情不好，就纷纷起来，日寇借口说要闹事，派兵荷枪实弹包围沈家。由于工人们手无寸铁，沈勋章只好与工人从后门逃走，杨氏三兄弟也趁机逃脱。逃到横花店子时（现土山机场），工人于河的腿被打伤，沈勋章也被日军杀害，全身被刺了70余刀，成了血人，惨不忍睹。杨氏三兄弟在混战中打死2个日本人，然后逃走。

此后三兄弟又联络工友，一起制造了多起列车颠覆事件。据群众统计，1933年到1934年，三兄弟破坏日军军车几十次，打击了日寇的侵略气焰，被群众称为杨氏三雄。

（四）东北青年救亡会在四平的活动

1938年2月成立于日本的东北青年救亡会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情报组织，其成员大部分都是伪满高级官吏子弟，出身于上流社会。他们基于民族大义，背叛自己的家庭，认定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未来，主动找党，成为共产主义战士，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，战斗在抗日战争的地下战线，光复后，又为东北的解放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东北青年救亡会是在3个秘密反日组织的基础上合并成立的：

一是东京反帝大同盟。创建者张为先、丁宜等。张为先，辽宁沈阳人，出身于资本家家庭。其父张惠霖是东北著名的富豪，曾担任过沈阳商会会长、志诚银行经理。1928年，张为先自费留学英国，在此期间经同学何松亭介绍加入了英国共产党，后转为中共党员。1934年春，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，到东北从事情报工作，但因未能接通组织关系而于1935年转赴日本留学，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。丁宜，吉林怀德人，是张为先在奉天省立第一高中读书时的同学。在接到张为先的信后，他也来到东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深造。张、丁二人遂秘密开展反满抗日活动，筹建反日组织。1936年8月，成立了东京反帝大同盟。该盟章程规定：凡东北籍学生，只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国纲领，不计其家庭出身如何，即可入盟；在盟内，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，宣传抗日救国思想。由于日本标榜言论自由，允许出版、销售国内外进步书籍，因此，在东京的书店里很容易买到马克思、列宁的著作以及鲁迅、艾思奇等人的作品。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，反帝大同盟的成员们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的了解，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，这为他们积极投身抗日救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。

（未完待续）